

## 隔代抚养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吗？

李彦楚 高晶晶\*

---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隔代抚养与老年人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使用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探究老年人的隔代抚养行为对其社会参与的影响及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提供隔代抚养能够显著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主要影响其串门、朋辈交流和参加社团三类社会参与行为，且这一影响在城乡、受教育水平和年龄层面表现出异质性。具体而言，隔代抚养主要促进了居住在乡村且相对年轻的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通过提供隔代抚养，老年人加强了与子女和亲戚朋友之间的联系，得到了更多来自子女的代际支持，从而促使其社会参与行为增加，并提升了福利。

**关键词** 社会参与 隔代抚养 老龄化 代际支持

---

### 一 引言

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是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核心议题，在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方面起到重要作用（Onishi et al., 2006；Silverstein & Parker, 2002；Wanchai & Phrompayak, 2019）。由于社会习俗和家庭代际传承的需要，大量老年人都承担着照顾孙子女的职责。为帮助子女带孩子，老年人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这一付出可能进而影响到其社会参与行为。在欧洲和美国，超过半数的老年人照料孙辈（Hank & Buber, 2009），而这一现象在中国同样大量存在（黄国桂等，2016；孙鹃娟、冀云，2016）。

---

\* 李彦楚，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电子邮箱：202111030157@mail.bnu.edu.cn；高晶晶（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电子邮箱：gaojj@bnu.edu.cn。本研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21NTSS07）、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青年课题（CFA190254）的资助。

但是，在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研究中，该现象往往被忽略，且老年人隔代抚养和社会参与之间的影响机制在现有的研究中仍不明晰。因此，本文探讨了隔代抚养对社会参与的影响和具体机制，以及对老年人福利的影响。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 18.70%，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13.50%<sup>①</sup>，中国目前面临着较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在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日益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积极老龄化”定义为“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至最大效应的过程”（Kalache & Gatti, 2003）。对此的研究和讨论除了关注“没有疾病和残疾”“身体和心理机能正常”两个方面以外，还集中于“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方面，即社会参与（Rowe & Kahn, 1997）。大量文献已经证实，社会参与能够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包括生活质量、情绪健康、抗抑郁能力等（Avlund et al., 2004; Fine, 2001; Hsu, 2007; Silverstein & Parker, 2002）。在进行社会参与的过程中，老年人也能够通过有偿劳动、志愿活动或者社团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能量，贡献自身的人力资源，为社会做出更多奉献。

然而，这部分“活跃”老年人群体身上承担着难以忽视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在人口快速老龄化与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背景下，隔代抚养现象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趋势。年轻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经济机会而流动，同时把孩子交给祖父母照顾（Silverstein & Parker, 2002）。由于家庭主义和传统性别角色的影响，母亲的责任，至少在照顾孩子方面的责任，转移到祖母身上（Lee & Bauer, 2013）。隔代抚养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而进行隔代抚养行为本身也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转移支付，影响着家庭之间的代际关系和经济决策（余靖雯等，2023）。

许多研究认为，隔代抚养是一件耗费老年人时间和精力事情（宋璐等，2013；肖雅勤，2017；Baker & Silverstein, 2008），但其对于社会参与的影响还不明晰。也有研究表明，这一行为对老年妇女的自我评价健康有积极影响，但在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下，影响效应会因为子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宋璐等，2008）。作为一种替代性家庭育儿行为，老年人的隔代抚养需要占据其日常生活的的时间，与劳动参与之间存在着彼此替代的关系。提供隔代抚养会降低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而且二者在 60 ~ 64 岁的老年人中有显著的负向关系（宋健等，2018；Hamilton & Jenkins, 2015）。退休

<sup>①</sup> 参见 <https://www.stats.gov.cn>。

之后，老年人非劳动性质的活动将逐步取代其劳动参与，而其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之间是否同样存在着时间挤占关系却并不明晰。相对有限的文献表明，隔代抚养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有促进作用或者无负面影响，但相关研究并未分析其影响的机制（马磊、林森苗，2020；闫宇等，2022；Arpino & Bordone，2017）。

因此，本文重点分析了隔代抚养对社会参与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本文构建了四期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老年群体的隔代抚养与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并对隔代抚养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机制进行了探索。本文考虑了不同家庭之间可能存在的异质性，控制了家庭固定效应，同时控制了每一期的年份固定效应，并采用工具变量“16岁以下的孙子女和重孙子女数量”进行因果识别。基准研究结果和机制分析均具有稳健性。

本文的研究有以下五点发现。首先，隔代抚养能够显著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该效应在采用“16岁以下的孙子女和重孙子女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中同样显著。这一基准结果与大部分以往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靳小怡、刘妍璐，2017；Lee & Bauer，2013；Liu & Lou，2017）。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串门、跟朋友交往”“向亲朋好友提供帮助”“参加社团”三类社会参与行为中。其次，隔代抚养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老年群体之间存在异质性，其效果主要存在于居住在农村且相对年轻的“活跃”老年人。第三，隔代抚养主要通过促进与子女互惠交流的方式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隔代抚养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种互惠行为，大多数子女会赡养父母，以回报养育之恩，而父母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给子女提供帮助以获得更多的赡养服务（黄庆波等，2017；王奎、李启明，2021）。如果老年人为孙子女提供了隔代抚养，子女对父母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都会提升，从而进一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第四，隔代抚养也能够通过改善老年人自身的社会交往网络，增加与亲戚和朋友的互动，进而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最后，在对老年人的福利分析中，本文还发现，隔代抚养能够通过增加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降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提高老年人的日常锻炼频率和身体机能。

本文的剩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与老年人隔代抚养和社会参与相关的文献；第三部分介绍使用的数据、变量构建和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展示基准模型的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包括基准回归、工具变量估计、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讨论隔代抚养的影响机制，以及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福利分析结果；最后是结论与讨论。

## 二 文献综述和理论机制

### (一) 社会参与

关于社会参与对老年人影响的研究多为横截面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其心理与精神健康的影响。Onishi et al. (2006) 发现，参与日常和娱乐活动，如与家人或邻居交谈，与老年人的健康生活质量显著相关，而且这种关联在有配偶和有业余爱好的老年人中明显更高。Silverstein & Parker (2002) 发现，老年人休闲活动参与程度的增加与主观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关。此外，积极的社会参与行为还能促进老年群体的情绪健康。通过积极的社交活动，可以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抑郁等负面情绪 (Avlund et al., 2004)。Lampinen et al. (2006) 的研究结果表明，休闲活动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Fine (2001) 则认为，参与休闲活动与老年人更高的自尊和更少的抑郁有关。除此之外，社会参与对老年人长寿和身体机能的改善也有一定贡献。与不从事生产性活动的老年人相比，参加有偿或无偿工作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更低 (Hsu, 2007)。

关于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行为的因素，现有研究更多考虑了老年群体本身的生理特征及其所属的社会环境。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个人因素相对较多，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性别、种族等），以及身体的损伤状况和活动能力。此外，社会参与也可能受到其他个体特征的影响，如动机、偏好、生活方式等 (Dahan-Oliel et al., 2008)。Gagliardi et al. (2007) 发现，75 岁以后参加某些类型的活动（如体育、户外活动和爱好）的人数有所下降，然而在一些国家中，家庭活动的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年龄的增长与社会参与的减少相关 (Costa & Neri, 2019; Jivraj et al., 2015)。Costa & Neri (2019) 发现，更高的家庭收入与更高的参与率相关。Lin (2017) 和 Willie-Tyndale et al. (2016) 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是老年人社会参与最显著的影响因子。而 Heatwole-Shank et al. (2020)、Huxhold et al. (2013) 发现，老年人较差的健康状况在整体上严重阻碍了社会参与。

除此之外，在社会支持与社区环境方面，也存在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因素。社区提供活动并让老年人参加能够显著提高社会参与 (Levasseur et al., 2015; Neville et al., 2018)。结合社会活动本身，Heatwole-Shank et al. (2020)、Kim & Yang (2016) 发现，获得福利和社区服务的便利性是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因素，而老年人对社区的态度和看法也会影响其参与情况 (Richard et al., 2009)。

以上文献表明，社会参与在整体上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心理健康和情绪稳定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这类文献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自身的个体特征如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或外部环境的影响，并未考虑老年人自身的行为如劳动或照料等的影响。部分研究讨论了与子女、伴侣同住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Desrosiers et al., 2004；Gagliardi et al., 2007），但对于老年人而言，其每天用于活动的时间有限，劳动或为家庭帮工都会影响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隔代抚养就是其主要活动之一。

## （二）隔代抚养

有关老年人隔代抚养行为的研究范围相对广泛，主要集中在隔代抚养对老年人认知与健康的影响上。Tian et al.(2021) 发现，中国老年妇女的社会参与和自评健康呈正相关，直接对他人有贡献的社会活动对自评健康的影响最为显著。此外，中介分析证实，照顾孙辈在社会参与和自评健康之间发挥了作用。Chen et al.(2011) 发现，孙辈和祖父母之间存在高同居率，同居祖父母提供了大量的照顾。与其他社会相比，中国的孙辈和祖父母同居的比例显著偏高。祖父母进行照料的动机是关心成年子女的福祉，以及履行父母支持的责任感（Lee & Bauer, 2013）。继续参与生产活动（照料孙辈、父母或者参与志愿服务）对老年人保持心理健康有好处，但每天照顾配偶的老年人会有更糟糕的心理健康状态（Liu & Lou, 2017；靳小怡、刘妍珺, 2017）。

有大量研究讨论了隔代抚养行为与老年人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靳小怡、刘妍珺, 2017；王奎、李启明, 2021；吴培材, 2018；肖雅勤, 2017；周晶等, 2016），大多数支持隔代抚养促进了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结论。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隔代抚养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马磊和林森苗（2020）的研究结果表明，隔代抚养能够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但未对其机制进行详细分析，仅仅考察了受影响的老年群体特征。闫宇等（2022）的研究进行了同样的讨论，并且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其进一步对这一部分老年群体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在性别和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Arpino & Bordone（2017）则进一步讨论了隔代抚养对于不同类型社会参与的影响，发现隔代抚养对老年女性志愿服务、参与教育或培训课程以及参与政治或社区相关组织都有负面影响。

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关于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相对匮乏。而隔代抚养影响社会参与的研究也不充分，较少探讨老年人隔代抚养影响社会参与的具体机制。因此，本文将在讨论隔代抚养对老年人社会参与行为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一效应的机制。

### 三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 2011 - 2018 年四期面板数据。CHARLS 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 (PPS) 方法, 覆盖了 150 个县级单位、450 个村级单位、约 1 万户家庭中的 1.7 万中老年群体, 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群体的整体情况, 具有一定的全国代表性。

#### (一) 社会参与和隔代抚养

本文选取是否参与社会活动、社会活动的种类与参与的频率作为核心因变量。基于李宗华 (2009) 和王莉莉 (2011) 对老年人社会参与概念与内涵的梳理, 本文将社会参与定义为社会交往行为, 即与他人进行接触或为社会做出贡献等行为。基于此, 本文选取了 CHARLS 问卷中“您过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社交活动?”和“过去一个月, 您每隔多长时间会做刚才说的这些活动?”两个问题进行衡量。对于第一个问题, 受访者过去一个月内进行的社会参与行为包括“串门、跟朋友交往”“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向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跳舞、健身、练气功等”“参加社团组织活动”“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照顾与您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者残疾人”“上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

此外, 李宗华 (2009) 讨论了不同层次的社会参与, 分别是家庭范围内活动、社会人际交往活动以及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类活动。由于第一层家庭范围内活动和第二层的社会人际交往活动较难区分, 本文将其合并为“老年人日常的社交活动”, 主要包含“串门、跟朋友交往”“打麻将、下棋、打牌、去社区活动室”“向不住在一起的亲人、朋友或者邻居提供帮助”“跳舞、健身、练气功等”“上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而对于第三层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类活动, 则主要考虑了老年人自身的社会贡献, 包含“参加社团组织活动”“志愿者活动或者慈善活动”“照顾与您不住在一起的病人或者残疾人”。除此之外, 本文还进一步考虑了参与种类的多少和参与的频率。参与种类的多少基于其选择不同类型社会参与的数量判断, 而参与频率主要来自问卷对于每种活动参与频率的衡量, 记为“差不多每天”“差不多每周”“不经常”, 令“差不多每天”的权重为 7, “差不多每周”的权重为 3, “不经常”的权重为 1, 以参与频率为权重将所有参与的社会活动进行加总。这一变量全面考虑了参与种类和参与频率, 数值越大, 社会参与水平越高。

对于自变量隔代抚养, 本文根据问题“过去一年, 您或者您配偶照看了哪些子

女？”以及“过去一年，您和您配偶大约花几周，每周多少小时来照看孩子？”分别构建了“过去一年照料的周数”以及“每周照料时长”两个指标。考虑到一位老人可能同时照顾多个子女的孩子，本文将照顾所有孩子的周数和时长进行加总，充分衡量了老年人的隔代抚养情况。

## （二）其他解释变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基于以往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研究，本文尽可能控制了其他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因素，主要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情况、婚姻状况、民族、宗教信仰、工作情况、户口、身体功能障碍情况和家庭支出水平。

在内生性处理方面，本文主要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回归分析。所使用的工具变量参考 Feng & Zhang（2018）、Mao et al.（2018）的研究，为老年人 16 岁以下的孙子女和重孙子女数量。这一变量直接从子女的需求侧影响老年人的隔代抚养行为，且与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无关。在本文的 2SLS 回归中，该变量也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在后续分析中，本文从老年人与子女的互动切入，讨论了隔代抚养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核心机制，主要涉及的变量包括子女所提供的代际支持、与子女接触的紧密程度和老年人自身的社交网络。在对老年人福利的分析中，进一步探讨了隔代抚养通过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对其心理健康和身体状况的改善作用。表 1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sup>①</sup>。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是否有照料行为	64353	0.34	0.47
每周照料时长	64353	27.47	58.84
过去一年照料的周数	64353	16.35	28.13
是否有社会参与行为	64353	0.53	0.50
社会参与种类	64353	0.85	1.04
社会参与频率	64345	1.65	2.12

<sup>①</sup> 限于篇幅，未能呈现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备索。此外，在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时，为了尽量减少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作者对各变量使用样本权重加权后进行描述性统计。但因所使用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部分变量的权重数值有缺失，可能导致描述性统计分析中观测数较后文回归分析有所减少。

续表

变量名称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是否有日常交往类社会参与	64353	0.52	0.50
是否有志愿社团类社会参与	64353	0.05	0.22
抑郁得分情况	57493	19.04	5.05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 四 实证分析模型和结果

### (一) 实证分析模型

分析隔代抚养对于社会参与的影响，关键是识别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即是否存在遗漏变量同时影响隔代抚养和社会参与，或者二者是否存在互为因果的可能性。由于老年人的隔代抚养行为主要来自子女生育和养育的需求，因此，处理内生性主要是解决遗漏变量问题。为此，本文采用了两种方法。首先，采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FE）控制未观测到的个体特征和时间特征。本文使用的是 CHARLS 2011 - 2018 年四期的数据，在控制每期的时间效应外，也基于地区、家庭、个体等多个分级水平对受访者个体特征进行了控制。其次，本文进一步采用了工具变量法进行 2SLS 回归。参考以往研究隔代抚养影响的文献，采用只影响隔代抚养而不影响其他社会参与因素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一步识别二者的因果效应。

为了缓解不同调查轮次的时间影响以及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本文使用了四期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

$$SP_{it} = \beta_0 + \beta_1 * Childcare_{it} + \beta_2 * Controls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Childcare_{it} = \beta_0 + \beta_1 * Childnum_{it} + \beta_2 * Controls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SP_{it} = \beta_0 + \beta_1 * \widehat{Childcare_{it}} + \beta_2 * Controls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在式（1）中， $SP_{it}$ 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下标  $i$  表示受访者个体， $t$  表示 CHARLS 的调查轮次； $Childcare_{it}$ 为隔代抚养情况，为核心的自变量； $Controls_{it}$ 为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人口学信息、身体状况以及是否有工作等其他影响因素； $\mu_i$ 为家庭固定效应， $\delta_t$ 为年份固定效应。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本文使用了个体 - 时间双重聚类稳健标准误。正如上文所言，针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构建了  $Childnum_{it}$ ，即 16 岁以下的孙子女和重孙子女数量这一变量用作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 2SLS 回归，

具体回归模型如式（2）和式（3）所示。

本文添加了家庭和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同家庭和年份的遗漏变量。首先，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不同的习俗文化，这对老年人的隔代抚养和社会参与行为均有影响。此外，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也不一致，有的家庭可能人丁兴旺，而有的家庭可能子女稀少，需要对其进行控制。因此，本文需要控制家庭固定效应以解决这种偏差。其次，由于 CHARLS 为追踪调查数据，不同轮次的调查具有自身的特性，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可以排除不同时期带来的混杂影响，例如 2016 年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影响。

## （二）基准回归结果

从式（1）所获得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表 2 的第（1）列至第（6）列报告了老年人隔代抚养对社会参与的影响，其中隔代抚养和社会参与都为 0-1 变量，代表老年人是否进行该行为。本文从社区范围的固定效应开始，逐步提高固定效应的水平。第（1）列的线性概率模型（LPM）估计包含了社区和年份固定效应，老年人隔代抚养对于社会参与的影响系数为 0.0319，说明老年人的隔代抚养行为和社会参与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老年人存在隔代抚养行为，则其产生社会参与行为的概率更高。平均而言，该概率将提高 3.19%。第（2）列保持固定效应项不变，添加了控制变量项，而第（3）列在加入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社区-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人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老年人的隔代抚养行为依旧能够促进其社会参与，但促进的幅度略有减小。在第（4）列，本文进一步将固定效应控制到家庭水平，控制了家庭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并且在第（5）列中控制了家庭-年份固定效应，进一步消除遗漏变量的影响。这并没有消除隔代抚养对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其同样在 1% 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相较于第（2）列和第（3）列有所提升，说明隔代抚养对于社会参与具有实际的促进效果。在第（6）列，本文控制了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进行代际照料，能够使社会参与的概率提高 2.28%。总体而言，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隔代抚养和社会参与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老年人照顾孙子女能够促进自身社会参与行为。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隔代抚养对社会参与的影响

	(1)	(2)	(3)	(4)	(5)	(6)
是否有照料行为	0.0319 *** (0.0048)	0.0274 *** (0.0049)	0.0229 *** (0.0049)	0.0273 *** (0.0056)	0.0408 ** (0.0164)	0.0228 *** (0.0057)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续表

	(1)	(2)	(3)	(4)	(5)	(6)
社区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家庭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个体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社区-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家庭-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观测数	65877	65877	65875	64942	50186	63178
因变量均值	0.5197	0.5197	0.5197	0.5199	0.5130	0.5207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在个体和时间水平上进行了双重聚类；\*、\*\*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3和表4展示了对老年人社会参与行为不同测量的回归结果。基于前文所述，本文进一步考虑了隔代抚养对老年人不同社会参与行为的影响。其中，表3考虑了参与种类的丰富度和参与的频率，将社会参与分为日常交往类和志愿社团类。表4则针对问卷中的每个回答，考虑了特定的社会参与行为。从表3可以发现，隔代抚养可以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种类的丰富度，并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频率。具体来说，提供隔代抚养可以使老年人社会参与种类增加0.05，占样本均值的5.7%；也能使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频率增加0.1天，占样本均值的6.4%。进一步分析发现，隔代抚养对社会参与行为的影响主要存在于日常交往类社会参与，但对志愿社团类社会参与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2.46%的日常交往类社会参与概率和0.63%的志愿社团类社会参与概率，分别占各自样本均值的4.8%和13.4%。这主要是因为日常交往在老年群体中更为广泛，而志愿社团类社会参与相较于前者具有一定的参与门槛，参与情况相对较少(李宗华, 2009)。

表3 隔代抚养对不同类型社会参与的影响

	社会参与种类	社会参与频率	日常交往类社会参与	志愿社团类社会参与
	(1)	(2)	(3)	(4)
是否有照料行为	0.0465 *** (0.0104)	0.1009 *** (0.0213)	0.0246 *** (0.0056)	0.0063 *** (0.002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续表

	社会参与种类	社会参与频率	日常交往类社会参与	志愿社团类社会参与
	(1)	(2)	(3)	(4)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64942	64942	64942	64942
R <sup>2</sup>	0.432	0.427	0.362	0.291
因变量均值	0.8167	1.5782	0.5117	0.047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在个体和时间水平上进行了双重聚类；\*、\*\*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4 隔代抚养对各种社会参与的影响

	串门、跟朋友交往	打麻将、打牌	向亲朋好友提供帮助	跳舞健身	参加社团	参加志愿者活动或慈善活动	照顾非同住的病人	上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
	(1)	(2)	(3)	(4)	(5)	(6)	(7)	(8)
是否有照料行为	0.0226 *** (0.0056)	0.0014 (0.0037)	0.0107 *** (0.0040)	0.0033 (0.0028)	0.0046 *** (0.0016)	0.0007 (0.0013)	0.0010 (0.0018)	-0.0011 (0.000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64942	64942	64942	64942	64942	64942	64942	64942
R <sup>2</sup>	0.329	0.463	0.291	0.387	0.298	0.262	0.238	0.278
因变量均值	0.3575	0.1918	0.1233	0.0755	0.0214	0.0130	0.0214	0.005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在个体和时间水平上进行了双重聚类；\*、\*\*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进一步考虑每一种社会参与的类型，表4的第(1)列至第(8)列分别汇报了隔代抚养对每一种类型的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从表4可以看出，隔代抚养对老年人社会参与行为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串门、跟朋友交往”“向亲朋好友提供帮助”“参加社团”，这三列的估计系数均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而其他列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提供孙子女照料对老年人参与家庭联系类社会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串门、跟朋友交往的概率提高了2.26%，向亲朋好友提供帮助的概率提高了1.07%。此外，提供隔代抚养使老年人参与社团组织活动的概率提升了0.46%，这一提升效果占样本均值的21.5%。整体来看，除“上学或者参加培训课程”外，提供隔代抚养对其他社

会参与行为都具有轻微正向的促进作用，也从侧面说明了隔代抚养在整体上促进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

在基准回归之外，除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和在每一轮调查中不变的宏观特征外，还可能有一些被遗漏的变量同时对老年人的隔代抚养和社会参与行为产生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参考了 Feng & Zhang (2018)、Mao et al.(2018) 的研究，使用“16 岁以下孙子女和重孙子女的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 2SLS 回归。其结果展现在表 5 中。

表 5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	2SLS 回归		
	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种类	社会参与频率
	(1)	(2)	(3)	(4)
是否有照料行为	0.0273 *** (0.0056)	0.2855 ** (0.1327)	0.6481 *** (0.2162)	1.4404 *** (0.4676)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检验		69.101	69.101	69.1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64942	64834	64834	6483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在个体和时间水平上进行了双重聚类；\*、\*\* 和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5 的第 (1) 列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第 (2) 列至第 (4) 列则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因变量，汇报了 2SLS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所有列的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检验均大于 10，说明其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没有弱工具变量问题。第 (2) 列至第 (4) 列报告的结果中，可以发现隔代抚养对于社会参与概率的影响在 5% 水平上显著，而对于社会参与种类和频率的影响在 1% 水平上显著。值得一提的是，在使用 2SLS 回归进行估计后，所有的估计系数都大于基准回归结果的估计系数。具体而言，老年人提供隔代抚养使得社会参与的概率提高了 28.5%，使得社会参与的种类多样性增加 0.65，社会参与的频率提高 1.44 天。

### (三) 异质性和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讨论隔代抚养对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在不同老年群体之间的差异。异质性结果如表 6、表 7、表 8 所示。其中，表 6 的第 (1) 列至第 (3) 列为性别异质

性，第（4）列至第（7）列为城乡异质性。在性别的异质性分析中，可以发现男性和女性两列的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系数大小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但交互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说明隔代抚养在男女之间的差异较小。基于当前中国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二元性，本文根据老年人目前居住的地区，将其分为城市、农村和城乡结合部进行异质性分析。分析结果发现，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受到隔代抚养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别，农村与照料的交互项显著。这一结果说明，隔代抚养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农村老年人，而非城市老年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城市的社会参与丰富度本身与农村存在显著差异，具有较多老年社团，且交通更为便捷，在没有隔代抚养的促进作用下，老年人也有十分便利的社会参与渠道；另一方面，城市老年人在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上与农村老年人有显著差别，这些特征对社会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Costa & Neri, 2019；Lin, 2017；Willie-Tyndale et al., 2016），覆盖了隔代抚养的影响。

表6 性别与城乡异质性分析

	男	女	性别交互	城市	乡村	城乡结合部	城乡交互
	(1)	(2)	(3)	(4)	(5)	(6)	(7)
是否有照料行为	0.0205 *** (0.0075)	0.0268 *** (0.0077)	0.0285 *** (0.0057)	0.0044 (0.0128)	0.0367 *** (0.0065)	-0.0113 (0.1009)	-0.0965 * (0.0551)
隔代抚养 * 女性			-0.0008 (0.0005)				
隔代抚养 * 城市							0.0880 (0.0556)
隔代抚养 * 农村							0.1357 ** (0.055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32678	29975	64942	15438	47695	348	64753
R <sup>2</sup>	0.470	0.509	0.361	0.449	0.351	0.662	0.36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在个体和时间水平上进行了双重聚类；\*、\*\*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7 不同年龄的异质性分析

	<50 岁	50~60 岁	60~70 岁	70~80 岁	>80 岁	交互项
	(1)	(2)	(3)	(4)	(5)	(6)
是否有照料行为	0.0714 *** (0.0272)	0.0263 *** (0.0098)	0.0194 ** (0.0098)	0.0082 (0.0189)	0.0806 (0.0560)	0.1229 *** (0.0409)
隔代抚养 * <50 岁						-0.0693 (0.0443)
隔代抚养 * 50~60 岁						-0.0972 ** (0.0417)
隔代抚养 * 60~70 岁						-0.1031 ** (0.0416)
隔代抚养 * 70~80 岁						-0.0912 ** (0.042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5622	21858	20602	9169	2225	64942
R <sup>2</sup>	0.513	0.427	0.421	0.443	0.492	0.36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在个体和时间水平上进行了双重聚类；\*、\*\* 和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8 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文盲	小学毕业	大专毕业	本科及以上学历	交互项
	(1)	(2)	(3)	(4)	(5)
是否有照料行为	0.0330 *** (0.0113)	0.0301 *** (0.0088)	0.0063 (0.0098)	0.0038 (0.0892)	0.0742 (0.0545)
隔代抚养 * 文盲					-0.0552 (0.0552)
隔代抚养 * 小学毕业					-0.0541 (0.0547)
隔代抚养 * 大专毕业					-0.0330 (0.054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15976	25312	20315	397	64209
R <sup>2</sup>	0.412	0.423	0.439	0.531	0.35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在个体和时间水平上进行了双重聚类；\*、\*\* 和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7和表8具体分析了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受教育水平的老年群体之间的异质性。本文将年龄分为五组进行讨论。从表7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升高，隔代抚养对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不断下降，对于年龄小于70岁的老年人，其促进作用均显著。随着年龄的增加，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年龄越大，隔代抚养的促进作用越小。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孙子女数量和自身提供照料及社会参与的能力都在不断下降。小于70岁的老年人正值孙辈出生或年幼的时期，因而此时子女对于隔代抚养的需求最强，老年人提供隔代抚养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联系，促进老年人参与日常交往类的社会活动。进一步对受教育水平（表8）进行异质性分析，从“文盲”“小学毕业”“大专毕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四个层次进行异质性分析。分析结果发现，隔代抚养对于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文盲”“小学毕业”层次，但其差异并不显著。由此可以发现，通过隔代抚养提升自身社会参与水平的老年群体主要为生活在农村、较为年轻的老年人。反之，对于生活在城市或高龄的老年人而言，隔代抚养带来的社会参与提升并不显著。

为了检验这一影响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对自变量进行了讨论，扩展构造了“过去一年照料的周数”和“每周照料时长”两个变量，进一步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采用照料周数和每周照料时长后，其影响结果同样显著。过去一年照料的周数对于社会参与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其系数表明照料的周数每增加一周，社会参与的概率增加0.03%。除此之外，本文还考虑了身体状态这一具体影响，拥有身体障碍的老年人既无法照顾孩子，也难有社会参与行为。为了排除身体障碍的内生性，本文将样本缩小至身体功能障碍得分小于10的老年人群体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9第（4）列至第（6）列所示，在大部分情况下，其结果也是显著的。

通过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整体而言，老年人提供照料能够显著促进其社会参与行为，包括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种类的多样性和社会参与的频率。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串门、跟朋友交往”“向亲朋好友提供帮助”“参加社团”等社会参与行为，并且在城乡、年龄和受教育水平之间存在异质性。生活在农村、受教育水平较低且较为年轻的老年群体，其社会参与行为受到隔代抚养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

表 9 稳健性检验

	全样本			健康子样本		
	(1)	(2)	(3)	(4)	(5)	(6)
过去一年照料的周数	0.0003 <sup>***</sup> (0.0001)			0.0003 <sup>***</sup> (0.0001)		
每周照料时长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是否有照料行为			0.0273 <sup>***</sup> (0.0056)			0.0259 <sup>***</sup> (0.006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64942	64942	64942	52934	52934	52934
R <sup>2</sup>	0.361	0.360	0.361	0.382	0.382	0.382
因变量均值	0.5199	0.5199	0.5199	0.5449	0.5449	0.544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在个体和时间水平上进行了双重聚类；\*、\*\*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 五 进一步分析

### (一) 机制分析

本文分析了隔代抚养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隔代抚养表面上是祖父母照料孙子女，实际上加强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父母提供隔代抚养可以帮助子女平衡工作和家庭，从而增加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精神支持，进一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此外，老年人也可以通过照顾孙子女增强自身的社交网络，与亲朋好友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进一步增加自身的社会交往行为。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父母提供隔代抚养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互惠和均衡，是维系家庭代际纽带的重要因素。大多数成年子女会选择赡养年老的父母以回报其早年的养育之恩，而为了获得子女更好的供养，老年父母也会以各种方式为成年子女提供支持。已有的研究发现，给下一代子女提供支持可以增强老年人自身的意志力和自主能力，从而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Deci et al., 2006) 与自身角色认同感 (Siebert et al., 1999)。通过与下一代的接触，老年人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Piercy et al., 2011)。在对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的探寻中，与子女的接触和子女的代际支持也是重要

的影响因素。谢立黎和汪斌（2019）的研究发现，与子女同住、老年人自身的婚姻状况和朋友支持都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模式有显著影响。他们还发现，收入更高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表现为高社会参与类型。彭青云和朱晓（2017）发现，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的经济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

因此，本文基于 CHARLS 数据构造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互动的变量，包含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经济往来和子女与老年人联系的频率。在经济往来方面，本文的变量构造主要源自问题“过去一年，在您子女不和您住在一起时，您或您的配偶从您子女那里收到过多少经济支持？”以及“过去一年，在您子女不和您住在一起时，您或您的配偶给予您子女多少经济支持？”。具体来说，本文构造了收到经济支持、给予经济支持和双向支持三个变量来进行衡量，其结果如表 10 所示。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给予孙子女照料能够增加与子女之间的经济交往，这种促进作用无论在收到支持、给予支持还是双向互动角度都是显著的，并且采用不同的自变量度量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父母提供隔代抚养可以增强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往来，并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从而促进亲情结构的稳固，丰富社会参与行为。

表 10 机制分析：经济支持

	收到子女经济支持		给予子女提供支持		双向支持	
	(1)	(2)	(3)	(4)	(5)	(6)
是否有照料行为	0.0210 *** (0.0056)		0.0211 *** (0.0053)		0.0188 *** (0.0045)	
每周照料时长		0.0003 *** (0.0001)		0.0002 * (0.0001)		0.0002 *** (0.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64942	64942	64942	64942	64936	64936
R <sup>2</sup>	0.592	0.592	0.462	0.462	0.401	0.40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在个体和时间水平上进行了双重聚类；\*、\*\*和\*\*\*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对于精神支持方面的分析，本文选取了与子女同住和与子女见面的频率两个指标进行衡量。判断是否与子女同住主要基于子女住址信息，在问卷“您子女现在一般住哪里？”中，前三个回答选项分别为“与受访者同住且经济上不独立”“与受访者同

住，但是经济上独立”“与受访者同一个院子（公寓）或者相邻的院子（公寓）”，由此可以判断同住情况。与子女见面的频率衡量的是与不住在一起的子女见面的频率。通过以上两个变量的构建，可以充分判断老年人与子女在经济往来以外的其他互动情况。回归结果如表 11 所示。整体而言，提供隔代抚养促进了与子女见面的频率和与子女同住的概率。老年人通过给予隔代抚养行为，可以与子女产生广泛的联系，包括与子女一同居住或者增加与子女见面的频率。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可以通过与子女联系或同住，增强与亲戚朋友的联系，组织和开展更多家庭之间的互动行为，从而增强自身的社会交往。

表 11 机制分析：精神支持

	与子女见面的频率			与子女同住		
	(1)	(2)	(3)	(4)	(5)	(6)
是否有照料行为	7.1003 ** (2.7600)			0.0327 *** (0.0060)		
过去一年照料的周数		0.1343 ** (0.0533)			0.0007 *** (0.0001)	
每周照料时长			0.0071 (0.0225)			0.0003 *** (0.00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64942	64942	64942	64176	64176	64176
R <sup>2</sup>	0.694	0.694	0.694	0.577	0.577	0.57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在个体和时间水平上进行了双重聚类；\*、\*\*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除了上述机制以外，老年人自身的社交网络也是促进其社会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与孩子相处，或通过学校或课外活动增加祖父母之间的社交网络和互动，可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McNamara & Gonzales, 2011）。老年人之间的朋辈支持也同样有此效果（谢立黎、汪斌, 2019）。提供隔代抚养在同类型的老年人之间能形成共同的话题，以“拉家常”的形式促进老年人兄弟姐妹和朋友之间的交流，稳固的社交网络可以进一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因此，本文通过构建朋友之间和兄弟姐妹之间的礼物交换指标来衡量老年人社交网络强度，其回归结果如表 12 所示。从结果中可以发现，隔代抚养可以显著促进老年人积极地与亲朋好友互动，从而增强其社会参与行为。

表 12 机制分析：朋辈社交网络

	朋友之间的礼物交换	收到兄弟姐妹礼物	赠予兄弟姐妹礼物	兄弟姐妹间的双向赠予
	(1)	(2)	(3)	(4)
是否有照料行为	0.0110 ** (0.0054)	0.0095 *** (0.0034)	0.0107 *** (0.0033)	0.0111 *** (0.00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64895	64942	64942	64942
R <sup>2</sup>	0.414	0.357	0.352	0.32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在个体和时间水平上进行了双重聚类；\*、\*\*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 (二) 福利分析

在隔代抚养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情况下，本文进一步衡量了其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本文选择了抑郁情况作为其精神状况的衡量指标，选择自身的锻炼情况和身体功能障碍得分作为其身体状况的衡量。其中，抑郁情况所选用的量表为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Andresen et al., 1994），数值越高表明抑郁情况越严重。而身体功能障碍得分则参考自吴培材（2018）构建，同样为数值越高身体障碍越严重。本文基于量表的计分情况，将抑郁情况和身体功能障碍情况进行了分组，抑郁情况由高到低分为四组，身体障碍分为三组。其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13所示。当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时，在平均水平上会降低其抑郁水平，促进老年人自身的锻炼，增强老年人的身体机能。

表 13 福利分析

	抑郁情况	锻炼情况	身体功能障碍得分（ADL）
	(1)	(2)	(3)
是否有照料行为	-0.0173 ** (0.0082)	0.0489 *** (0.0142)	-0.0076 ** (0.00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续表

	抑郁情况	锻炼情况	身体功能障碍得分 (ADL)
	(1)	(2)	(3)
观测数	64942	64942	64802
R <sup>2</sup>	0.371	0.459	0.441
因变量均值	2.5309	1.0609	1.181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在个体和时间水平上进行了双重聚类；\*、\*\* 和 \*\*\* 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2011 - 2018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 六 结论

在全球老龄化浪潮中，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该框架对于需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各国都适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中国的国家级战略，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实现自身价值。老年人积极的社会参与在多篇文献中都被证明能够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保持其晚年活力 (Avlund et al., 2004; Engelhardt et al., 2009; Lampinen et al., 2006)。

本文分析了隔代抚养对社会参与的影响，并提出了几个可能的影响机制。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 2SLS 回归，本文对 CHARLS 2011 - 2018 年四期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隔代抚养对于社会参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仅会促使原先没有社会参与行为的老年人产生社会参与行为，还会增加其社会参与的种类和频率。对特定的社会参与活动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隔代抚养主要促进的是老年人的“串门、跟朋友交往”“向亲朋好友提供帮助”“参加社团”三类社会参与行为。与 Hughes et al. (2007) 的研究类似，本文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隔代抚养的影响对于不同性别和教育水平的老年人具有稳健性，但在其他维度的异质性分析中，如城乡和年龄，均发现了显著的异质性。隔代抚养对于社会参与的促进主要作用于居住在农村且年纪相对较轻的“活跃”老年人群体。具体而言，隔代抚养对于 70 岁以下的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老年人提供隔代抚养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增强老年人与子辈之间的互惠交流，促进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为子女提供隔代抚养一方面能够增强子女对老年人的代际支持，使老年人获得更多支持隔代抚养的经济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增强老年人与子女的精神支持，进而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除此之外，

提供隔代抚养也能够增加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概率和与非同住子女见面的频率。与子女同住被证明可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谢立黎、汪斌，2019；Piercy et al., 2011）。此外，本文还发现照顾孙辈能够通过增强自身社交网络的方式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具体表现为通过照料孙子女，与同辈老年人产生共同话题，在带孙子女出行、散步等过程中与其他孩子的父母或自身亲戚进行交流，从而增强其社会参与。在社会参与的影响方面，本文考虑了其带给老年人的福利，发现通过隔代抚养提高社会参与，能够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体表现为抑郁水平的下降与锻炼水平和身体机能的提升。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多支文献均有一定的贡献。首先，本文考虑了照顾孙子女和参与社会活动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和协同，并进行了辨析，最终发现照顾孙子女的行为和社会参与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冲突，照顾孙子女反而能够通过增强与子女交流等其他方式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其次，本文补充了关于隔代抚养影响的文献，发现通过老年人的隔代抚养行为，可以进一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行为，从而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也为积极老龄化的讨论作出了边际贡献。最后，本文补充了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因素的文献，发现代际之间的互动行为可以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在个人和社会环境因素外，讨论了家庭奉献和代际交互对于社会参与的作用，为健康老龄化的政策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证据支持。

## 参考文献：

- 黄国桂、杜鹏、陈功（2016），《隔代照料对于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探析》，《人口与发展》第6期，第93-100页。
- 黄庆波、胡玉坤、陈功（2017），《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人口与发展》第1期，第43-54页。
- 靳小怡、刘妍璐（2017），《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流动老人和非流动老人的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第119-129页。
- 李宗华（2009），《近30年来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研究的综述》，《东岳论丛》第8期，第60-64页。
- 马磊、林森苗（2020），《隔代照料减少了老年人的社区参与吗？——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老龄科学研究》第5期，第42-53页。

- 彭青云、朱晓 (2017), 《影响城市老年人经济活动参与的家庭因素分析》, 《人口与发展》第3期, 第68-75页。
- 宋健、王记文、秦婷婷 (2018), 《孙子女照料与老年人就业的关系研究》, 《人口与经济》第3期, 第92-103页。
- 宋璐、李亮、李树茁 (2013), 《照料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社会学研究》第6期, 第215-237页。
- 宋璐、李树茁、李亮 (2008), 《提供孙子女照料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人口与发展》第3期, 第10-18页。
- 孙鹃娟、冀云 (2016), 《中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对老化态度的影响》, 《人口与发展》第4期, 第79-86页。
- 王奎、李启明 (2021), 《子女代际支持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 自我老化态度和社会活动参与的中介作用》,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第82-92页。
- 王莉莉 (2011), 《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理论、实证与政策研究综述》, 《人口与发展》第3期, 第35-43页。
- 吴培材 (2018), 《照料孙子女对城乡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第117-131页。
- 肖雅勤 (2017),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 CHARLS 的实证研究》, 《社会保障研究》第1期, 第33-39页。
- 谢立黎、汪斌 (2019), 《积极老龄化视野下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及影响因素》, 《人口研究》第3期, 第17-30页。
- 闫宇、方亚、李木易、曾雁冰 (2022), 《隔代照料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基于 2018 年 CHARLS 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第9期, 第699-703页。
- 余靖雯、麦东仁、龚六堂 (2023), 《社会养老保险、家庭隔代抚养与老年人健康》, 《经济学(季刊)》第1期, 第108-124页。
- 周晶、韩央迪、Weiyu Mao、Yura Lee、Iris Chi (2016), 《照料孙子女的经历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 《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第81-96页。
- Andresen, Elena, Judith Malmgren, William Carter & Donald Patrick (1994). Screening for Depression in Well Older Adults: Evaluation of a Short Form of the CES-D. *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10 (2), 77-84.
- Arpino, Bruno & Valeria Bordone (2017). Regular Provision of Grandchild Care and Participation

- in Social Activities.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15 (1), 135 – 174.
- Avlund, Kirsten, Rikke Lund, Bjørn Holstein & Pernille Due (2004). Social Relations as Determinant of Onset of Disability in Aging.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38 (1), 85 – 99.
- Baker, Lindsey & Merrill Silverstein (2008).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Grandparents Raising Grandchildren: The Impact of Participation in Multiple Roles. *Journal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6 (3), 285 – 304.
- Chen, Feinian, Guangya Liu & Christine Mair (2011). 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Context: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 China. *Social Forces*, 90 (2), 571 – 594.
- Costa, Taiguara Bertelli & Anita Liberalesso Neri (2019). Associated Factors with Physical Activity and Social Activity in a Sample of Brazilian Older Adults: Data from the FIBRA Study. *Brazili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2, e190022.
- Dahan-Oliel, Noemi, Isabelle Gelinis & Barbara Mazer (2008).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Elderly: What Does the Literature Tell Us? *Critical Reviews in Physical and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20 (2), 159 – 176.
- Deci, Edward, Jennifer la Guardia, Arlen Moller, Marc Scheiner & Richard Ryan (2006). On the Benefits of Giving as Well as Receiving Autonomy Support: Mutuality in Close Friendshi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 (3), 313 – 327.
- Desrosiers, Johanne, Luc Noreau & Annie Rochette (2004).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Older Adults in Quebec. *Aging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16 (5), 406 – 412.
- Engelhardt, Henriette, Isabella Buber, Vegard Skirbekk & Alexia Prskawetz (2009). Social Involvement, Behavioural Risks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among Older People. *Ageing & Society*, 30 (5), 779 – 809.
- Feng, Jin & Xiaohan Zhang (2018). Retirement and Grandchild Care in Urban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24 (2), 240 – 264.
- Fine, Jonathan (2001). The Effect of Leisure Activity on Depression in the Elderly: Implications for the Field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Occupational Therapy in Health Care*, 13 (1), 45 – 59.
- Gagliardi, Cristina, Liana Spazzafumo, Fiorella Marcellini, Heidrun Mollenkopf, Isto Ruoppila, Mart Tacken & Zsuzsa Szémann (2007). The Outdoor Mobility and Leisure Activities of Older People in Five European Countries. *Ageing & Society*, 27 (5), 683 – 700.

- Hamilton, Myra & Bridget Jenkins (2015). *Grandparent Childcare and Labour Market Participation in Australia*. Melbourne: National Seniors Australia.
- Hank, Karsten & Isabella Buber (2009). Grandparents Caring for Their Grandchildren: Findings from the 2004 Survey of Health, 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0 (1), 53 – 73.
- Heatwole-Shank, Kendra, Benjamin Kenley, Stacy Brown, Jenna Shipley, Maya Baum & Chloe Beers (2020). “We Need More Things for Us”: Being Low Income and Underemployed in Older Age. *Canadi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87 (1), 21 – 29.
- Hsu, Hui-Chuan (2007). Does Social Participation by the Elderly Reduce Mortality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Aging & Mental Health*, 11 (6), 699 – 707.
- Hughes, Mary, Linda Waite, Tracey LaPierre & Ye Luo (2007). All in the Family: The Impact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on Grandparents’ Health. *Journals of Gerontology-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2 (2), S108 – S119.
- Huxhold, Oliver, Katherine Fiori & Tim Windsor (2013). The Dynamic Interplay of Social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Health: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Psychology and Aging*, 28 (1), 3 – 16.
- Jivraj, Stephen, James Nazroo & Matt Barnes (2015). Short- and Long-Term Determinants of Social Detachment in Later Life. *Ageing & Society*, 36 (5), 924 – 945.
- Kalache, Alexandre & Anna Gatti (2003).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Advances in Gerontology*, 11, 7 – 18.
- Kim, Deokju & Yeongae Yang (2016). The Effect of Using Welfare IT Convergence Contents on Physical Function, Depress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Elderly. *Journal of Physical Therapy Science*, 28 (3), 886 – 890.
- Lampinen, Päivi, Riitta-Liisa Heikkinen, Marku Kauppinen & Eino Heikkinen (2006). Activity as a Predictor of Mental Well-Being among Older Adults. *Aging & Mental Health*, 10 (5), 454 – 466.
- Lee, Jaerim & Jean Bauer (2013). Motivations for Providing and Utilizing Child Care by Grandmothers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 (2), 381 – 402.
- Levasseur, Mélanie, Alan Cohen, Marie-France Dubois, Mélissa Génereux, Lucie Richard, France-Hélène Therrien & Hélène Payette (2015).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Older Adults Living in Metropolitan, Urban, and Rural Areas;

- The NuAg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5 (8), 1718 – 1725.
- Lin, Wenyi (2017). A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of Older Adults in China: Based on the CHARLS2011 Data Set. *Health &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25 (3), 1160 – 1168.
- Liu, Huiying & Vivian Lou (2017). Patterns of Productive Activity Engagement as a Longitudinal Predictor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Older Adults in Urban China. *Aging & Mental Health*, 21 (11), 1147 – 1154.
- Mao, Shangyi, Rachel Connelly & Xinxin Chen (2018). Stuck in the Middle: Off-Farm Employment and Caregiving among Middle-Aged Rural Chinese. *Feminist Economics*, 24 (2), 100 – 121.
- McNamara, Tay & Ernest Gonzales (2011). Volunteer Transitions among Older Adults: The Role of Human,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Later Lif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6 (4), 490 – 501.
- Neville, Stephen, Jeffery Adams, Sara Napier, Kay Shannon & Debra Jackson (2018). “Engaging in My Rural Community”: Perceptions of People Aged 85 Years and Ov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on Health and Well-Being*, 13 (1), 1503908.
- Onishi, Joji, Yuichiro Masuda, Yusuke Suzuki, Tadao Gotoh, Takashi Kawamura & Akihisa Iguchi (2006). The Pleasurable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43 (2), 147 – 155.
- Piercy, Kathleen, Cheryl Cheek & Boyd Teemant (2011). Challenges and Psychosocial Growth for Older Volunteers Giving Intensive Humanitarian Service. *The Gerontologist*, 51 (4), 550 – 560.
- Richard, Lucie, Lise Gauvin, Céline Gosselin & Sophie Laforest (2009). Staying Connected: Neighbourhood Correlate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Older Adults Living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in Montréal, Quebec.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24 (1), 46 – 57.
- Rowe, John & Robert Kahn (1997). Successful Aging. *The Gerontologist*, 37 (4), 433 – 440.
- Siebert, Darcy, Elizabeth Mutran & Donald Reitzes (1999). Friendship and Social Support: The Importance of Role Identity to Aging Adults. *Social Work*, 44 (6), 522 – 533.
- Silverstein, Merrill & Marti Parker (2002). Leisure Activities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the Oldest Old in Sweden. *Research on Aging*, 24 (5), 528 – 547.

- Tian, Shuliu, Lei Xu & Xiangling Wu (2021). Impacts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n Self-Rated Health of Aging Women in China: With a Mediating Role of Caring for Grandchildr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 (11), 5790.
- Wanchai, Ausanee & Duangjai Phrompayak (2019). Social Participation Types and Benefits on Health Outcomes for Elder People: A Systematic Review. *Ageing International*, 44 (3), 223 – 233.
- Willie-Tyndale, Douladel, Desmalee Holder-Nevis, Kathryn Mitchell-Fearon, Kenneth James, Hazel Laws, Norman Waldron & Denise Eldemire-Shearer (2016).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e Association with Socio-Demographic and Health-Related Factors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in Jamaic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Gerontology*, 31 (4), 427 – 447.

## Does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Affect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the Elderly?

Li Yanchu & Gao Jingjing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the elderly. Using data from four waves (2011 – 2018) of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it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on elderly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mechanisms of this impact. The study finds that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the elderly, mainly influencing three types of social activities: visiting others, peer communication, and joining social groups. Additionally, this impact varies by urban-rural residence, education level, and age. Specifically,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mainly boosts social participation among elderly individuals living in rural areas and those who are relatively younger.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the elderly strengthen their connections with their children, relatives, and friends, receive more support from their children, which in turn increases their social activities and enhances their well-being.

**Keywords:** social participation, intergenerational caregiving, aging,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JEL Classification:** D60, I12, J46

(责任编辑: 合羽)